

# 试论许云樵的马新暹史研究

## An Assessment of Hsu Yun-Tsiao's Malaya and Siam Studies

廖文辉\*

(LEW Bon Hoi)

### 摘要

许云樵的学术研究上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即马来亚史和暹罗史的研究。前者是他落地生根的国家，后者是他南来之初教学旅居之所在，这两个地区皆是他相当熟悉的地方，同时他又兼通两国语文，使其在研究上如鱼得水。在马来亚史的研究方面最可注意者是许云樵对马来亚国史建构的努力，尤其是古代史的建构，他能将模糊不清的古史勾勒出一个轮廓，同时也注意史料的译介。至于暹罗史研究方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即中暹和日暹交通关系研究、暹罗古史研究，北大年史研究，至于他在暹罗史研究上最大的贡献厥为沟通中暹史料，并对部分暹文研究成果和原始史料进行了汉译。

**关键词：**许云樵、马来亚、暹罗

### Abstract

The two major areas of research of Hsu Yun-Tsiao are in the historical studies of Malaya and of Siam. Malaya was where he finally put down roots and Siam was his earliest place of residence after leaving China. His familiarity with both these countries and the mastery of their languages were stood him in good stead in his subsequent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Malaya studies, the most noticeable feature of his Hsu's research was the attempt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Malaya, especially of the ancient period. He succeeded in producing an outline of the ancient history of Malaya and at the same time felt a need in translating selected historical materials. His work on Siam studies may be grouped under three categories, namely,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between Siam and China and with Japa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iam, and studies on Patani history. His major contribution to Siamese historical studies was in integrat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relating to China and Siam, as well as in the translation of selected Siam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to Chinese.

**Key Words:** Hsu Yun-Tsiao, Malaya, Siam

---

\* 廖文辉博士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高级讲师。电邮地址: bonhoi.lew@newera.edu.my

## 一、前言

许云樵为马新东南亚史研究的泰斗，著述等身，兼且研究领域广泛，编译注著皆能。（廖文辉2006：1-27）学界目前不乏许云樵的研究论文，如崔贵强的〈许云樵：学识渊博的史学家〉（崔贵强2001：131-175）；廖文辉的〈试论许云樵的乾嘉朴学传统〉（廖文辉2004：71-92）、〈许云樵在马新华文源流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局限〉（廖文辉2005：143-161）、〈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学术上的贡献〉（廖文辉2006：1-27）、〈许云樵的历史文献学〉（廖文辉2008：3-15）和〈试论许云樵的交通史研究〉（廖文辉2012：205-235）；邱彩韵的《马新汉学家许云樵研究》（邱彩韵2010）；廖冰凌的〈论南洋学者许云樵之冒险小说《少年航海家》〉<sup>1</sup>和〈许云樵与战后华文刊物《马来亚少年》〉<sup>2</sup>；章星虹的〈战后初期的许云樵：搭建南洋研究普及平台——以《南洋杂志》和《马来亚少年》为考察对象（1946-48）〉<sup>3</sup>。

但论述许云樵在马新暹史上的研究成果，似乎仍有待加强，故此本文之作即在探讨许云樵学术研究上两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即马来亚史和暹罗史的研究加以论述。前者是他落地生根的国家，后者是他南来之初教学旅居之所在，这两个地区皆是他相当熟悉的地方，同时又兼通两国的语文，使其在研究上如鱼得水。

## 二、马来亚史的研究

马来亚史研究方面最可注意者是许云樵对马来亚国史建构的努力。许云樵对马来亚史的研究，有其一套见解与看法，他认为马来亚史所以有研究的必要，是基于如下三个因素：“首先是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乎利用过去的宝贵经验，应付现实的重大问题，推测未来的正确动向；其次是历史是国家民族谋继续生存的精神武器……谁都觉得研究本国历史的重要，谁都觉得有自编历史的必要；最后是国家要谋富强，自当重视本国的历史。”（许云樵1961a：13-14）许云樵把马来亚当成自己的家国，因此研究马来亚史就是研究国史，他也是南来的南洋研究学者当中，陈育崧以外，另一位极力提倡“马来亚化”的南洋研究学者。所谓“马来亚化”就是要强调马来亚的本位文化，马来亚的本位文化，是由马来亚各主要民族，以能适应马来亚环境的本身文化，贡献给马来亚而建设起来的。马来亚化便是强调这一种文化的地方性，而不是要使这种文化单纯化，更不是将某些文化成分消灭。因此当充分善为利用我们这本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许云樵1961c：9）研究国史在许云樵眼中

<sup>1</sup> 2011年8月9日至11日于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办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0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之论文。

<sup>2</sup> 中国绍兴文理学院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之旅”暨中马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

<sup>3</sup> 2011年12月3-4日，拉曼大学中华研究中心、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联办“马新历史人物学术研讨会”发表的论文。

无疑是尽一己国民的责任，为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尽绵力。

明乎研究国史的动机，他也不忘提出一些可以依循的方法和经验。首要的当务之急在史料的搜集，他说：“《马来亚史》却是东西权威学者考证心得的结集……为求完善，不当固步自封，尽量吸收外来的资料和外人的贡献，以资充实。”

（许云樵1961b：7）他进一步认为：“马来亚历史上所失落的环节，也将赖邻国文献的支持而得衔接，要不然，马来亚历史的完整体系，将无法建立。”（许云樵1961a：14）因此，“为建设马来亚的历史体系，我们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文化遗产，我们兄弟民族的文化遗产固然少不了，即使是有血仇的民族的文獻，我们也要重视。多方面的搜集资料，多方面的校讎考订”（许云樵1961c：9）、“地下的史前文化宝藏，更有待我们去发掘，从今年所出土的遗物看来，马来亚的史前史研究，方兴未艾。考古家已有很多资料，供给我们探索初民的原始共产社会的生活，因此我们可以把马来亚的历史体系，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许云樵1961a：18）“从事历史地理的考证，除了根据文献之外，还得搜求物证，最主要的物证是碑铭，因为它是文物兼备的证据。”（许云樵1961a：162）许云樵曾经留心碑铭，每有所见，辄自抄录，并加以翻译和注释，以供学者参考。<sup>4</sup>

由于马来亚本身没有充分的文献供史家采摭，史家便得向邻近各国的文献中发掘，因此语文知识是马来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利器。“我们必须从浩瀚的中国载籍中埋头探索，我们又须向艰涩深奥的梵文典籍作学术进军，我们也须搜求阿拉伯文、暹罗文、越南文、日本文、印尼文、缅甸文以及英、荷、法、葡、西等各国文字的资料，来充实这一个时期的缺陷。”（许云樵1961a：18）“因此，我觉得研究任何东南亚国别史，不仅马来亚史，非得多多增强我们的语文知识不可！最近我在编著这本《马来亚史》时，遇到许多考证上的疑难，都得凭丰富的语文知识，予以解决。”（许云樵1961b：5）有了语言的优势，还必须有“博闻强记的历史学家和学贯中西的现代通人共同努力”，那是因为“马来亚没有古代文献，仅有的一部《马来纪年》，完成于1612年，也只是不上四百年的一部晚出之书。因此，我们要为马来亚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历史体系，非得涉猎华梵坟典，广事搜求各家考据，而能融会贯通，方得集其大成。”（许云樵1961b：2）上述条件具足，最后还必须“对真伪的辩证，应有客观的意识，科学的方法。去取之间，观点须正确，态度须公正，不能以一己的好恶，厚此薄彼，不能以从事的难易，避重就轻，更不能为趋时而附和，人云亦云，尤不该为政治的因素，而别具用心。一位博学的历史家，要完成他不朽的盛业，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许云樵1961a：18-19）

在许云樵眼中看来，国史研究固然重要，更为迫切的是马来亚古代史的建构，那是因为马六甲王朝以前的历史，几乎一片空白苍茫，“时至今日，马来亚还没有

<sup>4</sup> 他的碑铭整理可见《碑铭汇录》，《星洲日报·南洋文化》，1940年6月3、4、5、6日。

一部马来亚人所写的、体系完整的马来亚史。以往只有英国人用殖民地眼光编写的马来亚史，不仅观点不同，而且史料也嫌贫乏。他们以欧力东渐后才为有史时期，即使开展至满刺加王开始，也不过五百年。近数十年来，史前文化遗物陆续出土，他们虽也加以利用，可是自史前以迄近代的五百年之间，却是一大片空白。”（许云樵1961a: 13）他亦说：“东南亚各国除了纯粹接受中华文化的越南之外，都是没有古代史的，马来亚也不能例外。往日编写马来亚史的学者，只注重欧人东来以后的史实，其实那只是欧人在马来亚的殖民史，是不到五百年的近代史而已。一个国家只有史前史和近代史而无古代史和中世史，未免太不成话。况且严格说起来，欧人殖民史也不是马来亚本身所创造的历史。”（许云樵1961b: 1）在试图建构新加坡古史和探索其历史进程时，他也发出如斯感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他们悠久的历史，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史实没有记载下来，他们的史迹无意识中被湮灭了。有识之士想要用种种方法加以追溯，然而常遭殖民地主义者所栽培的薪传人物所阻挠，因此到目前为止，新加坡尚无一本完整而自编的国史，这是多可惜可叹的事啊！”<sup>5</sup>

为此，他在战前既已下定决心从事古史的建构工作，“三十年前，我就下决心要为马来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古代史而努力，希望为它们建设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体系。三十年来的努力，我虽没有什么成就，但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是抱同一的目标而努力，而鼓吹，如果我拙于才力，困于环境而不能完成我的志愿，我希望年轻同志们继续努力完成这当仁不让的有意义工作。”（许云樵1961c: 8）他三十年来“常以此勉人，也无时无刻策励自己。”（许云樵1961a: 2）“所以本世纪以来，虽有许多权威学者作马来亚史的研究，但除了以近代史为主的温士德（R. O. Winstedt）的杰作外，竟没有人能为马来亚不惮烦地从事编写完整的历史体系，以致我鼓吹了三十年，还只好自己来任‘廖化作先锋’，编著一本草创的马来亚通史。”（许云樵1961a: 6-7）

许云樵的马来亚古史研究有几个值得留意的特点。首先是他往往能将一般学者都无法搞清楚，面貌模糊，乃至语焉不详的古史，凭他丰富的史料，多语的优势，旁征博引，排比罗列，据其历史发展的先后顺序勾勒出一个轮廓，有者还能将其原委细说从头。例如他考究新加坡的从古到今名称的演变，清楚明确演示如示：“从2世纪希腊文献中的Sabara和三国时的蒲罗中国，到唐代的罗越，宋代的凌牙门和日罗亭，元代的龙牙门、单马锡和麻里予儿，明代的淡马锡，和巫文载籍中的Tamasik和Singhapura，英人把它改成Singapore，现在华文译作新加坡和星洲。自从石叻门辟为海港后，华人也把石叻作为星洲的别名，其实石叻是巫语海峡，并非实在地名。”<sup>6</sup>至于吉打的古代史，他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时代，个罗时代和羯荼时代。个罗时代

<sup>5</sup> 许云樵，〈新加坡历史的探索及其演进〉，页36-41，文献出处不详。

<sup>6</sup> 许云樵，〈新加坡历史的探索及其演进〉，文献出处不详。

是淡弥尔人的拓殖时代……大约始自4世纪……羯荼时代是南传佛教兴盛时代……大约始自7世纪。至于吉陀时代，则是它的中世史阶段，自9世纪开始，以迄14世纪。这是一个注犍暹罗势力交替的时代，此后便是吉达时代，是奉满刺加王国正朔前后的一个内忧外患时期，也就是巫人统治时代开始。”（许云樵1961a: 134-135）有关柔佛的古名原委，他进行如斯整理：“柔佛最古的名称为爪哇语Wurawari（乌罗哇利）……义为‘清水’，由此转为《马来纪年》中的Ganggayu（新鲜的水），受暹罗控制时转讹为Klang Kio（宝库），爪哇史籍便称它作‘Ujong Galoh’（宝极），又因为阿刺伯语称‘宝石’为Jauhar或Johor，柔佛一名便由此产生。柔佛另一个古名为Pemelekahan（卑弥梨加汉）……在1365年的《爪哇史颂》则称它作Ujong Medini（地极），后来转成Ujong Tanah（明代载籍作乌丁礁林）。至于宋代的日罗亭（Yirudingam）又是它另一更古的别称。”（许云樵1975: 130-131）

在其它国家地区的历史研究，他也秉持这种作风，如在琉球和东南亚诸国的交通关系研究上，他不忘将琉球的历史发展，根据古籍作一简单的论述，厘清琉球一名在历代载籍中之确指。<sup>7</sup>其他如暹罗古国历史<sup>8</sup>、老挝的古史（许云樵1939: 71-78）等莫不如此。他所以能如此条理分明、脉络清晰的细致论述，主要归功于他对中国古籍的充分和全面掌握，这是许多西方学者有所不及的地方，这也是为何他能与西方或日本汉学家作学术对话，还能进一步指正、批驳和纠谬他们研究观点和论述上的问题。此外，他也依据这些古籍，不忘将个别国家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关系作一番梳理。

其次，研究论述以外，他极为注意史料的译介。研究新加坡开埠史以及当时柔佛与新加坡的关系，莱佛士和柔佛天猛公签订的条约是关键文献，同时这也是马来亚历史上其中一份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为此他将条约内容详加翻译，并给予解析。<sup>9</sup>〈柔佛的港主制度〉一文中他将所有和港主制度相关的巫文文件如港契（Surat Sungai）、委任状（Tauliah）和81条的《港主法令》（*Kanun Kangchu*）全文汉译发表。（许云樵1961d: 23-27）这些苦功都是一般研究人员或学者所不为的。

他也善于发掘和使用新材料，如他根据琉球文档《历代宝案》，先后完成多篇东西交通史方面的文章，填补学术研究上的空白，即是个显著的例子。所以如此，是因为“余向见有等学者，苟有所珍获，辄自秘不肯示人，淡夸耀其价值之崇高，世莫与匹；请其发表，则多方推诿，即以稿酬为寿，亦有难色，殆以为藏之名山，始能瞑目。奈何，白云苍狗，世事无常，不数年间，遭楚人之炬者有之，因乱离亡佚者有之。为不肖称售者有之……不一而足。一念之私，斯文沦亡，谁为为之？孰

<sup>7</sup> 有关论述可详见〈琉球大泥通商考〉引言部分，《民众报新春特辑》，1972，第15版。

<sup>8</sup> 许云樵，〈暹罗古国考〉，《暹罗华侨日报星期刊》，第1卷第17、18期，发表于1930年代，确实出刊年份不详，皆刊于页5-7。

<sup>9</sup> 条约译文详见《东南亚研究》，第5卷，1969，页91-94。解读详见〈柔佛考〉，载《新山区中华工会五十周年金禧纪念特刊》，新山，1975，页124-130。

令致之？窃颇痛疾之。故自获此项珍贵资料后，即欲公诸同好，以广流传，并拟为之考订，以通其读。”（许云樵1951a: 16）

由于深受乾嘉考据学的研究传统影响，许云樵的史学研究文章常会看到他采用传统乾嘉考据手法，大量抄录史料，并加以译注爬梳，如〈元明清三代中南贸易演变考〉，他为了探讨元明清三代中国和南洋贸易的变化，他将三个朝代个别最具代表性有关海外记录的著述，即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和清代谢清高的《海录》，将与贸易有关的记载，整理抄录，相互参合比对。这些资料占全文八九十的百分比；〈星马私会党与洪门天地会的渊源〉为探究洪门起源，大段抄引大英博物馆馆藏的洪门写本，以及平山周和萧一山的研究成果；〈中国西南——这暹罗民族的老家〉大量征引林惠祥和马长寿的著述，以及《云南通志》、《岭表记蛮》、《小方壶斋》等古籍来论述说明；〈《明史》暹罗考释〉将其原文记载晦暗不明、其意未明之处加以考释、注释、纠谬和补充。

其三在研究内容和观点方面，他将现泰南的北大年列入马来亚史大论述范围，这是目前不论中英文著述皆不列入处理的部分。北大年虽已非马来西亚的国土，但远在暹罗将之并入以前确实如假包换的巫人政权，并且和半岛的丁加奴、吉兰丹、彭亨和柔佛有历史渊源和纠葛。在马六甲王朝覆灭后成为半岛北部重要的商港，直到19世纪为暹罗并吞为止。这样的处理无疑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此外，许云樵的历史研究也不忽略地理，史地合一，他在论述东南亚史时会将地理学带进他的研究，如在《马来亚史》中，他即从造山运动、地壳变动讲起（页21-25），这是绝大多数同性质著述所没有的。他本身也写了好一些东南亚研究中有关地理研究的文章，计有〈东南亚气候垂直和地形破碎〉（许云樵1959b: 27）、〈马来亚的地形和地质〉（许云樵1956a: 3-4）、〈怎样研究地理〉（许云樵1956b: 3）、〈马来亚新志总纲〉（许云樵1957a: 1-23）、〈沙峇新志〉（许云樵1969: 145-155）、《南洋史》之第二篇第1章第1节（页19-20）。<sup>10</sup>许云樵也极为重视地下考古挖掘的成果，因为古史的建构，尤其是东南亚古史文献资料不足征，实在有赖于地下的发掘。他常撰文介绍东南亚的考古挖掘，如〈吉兰丹瓜家新石器时代骸骨发现记〉（许云樵1954a: 46-48）、〈分茅岭出土之古石刻〉（许云樵1951b: 33-34）等是。在《南洋史》（页21-24）和《马来亚史》（页26-55）中他也大量采用考古报告和成果。他在撰写《东南亚通史简编》（未完稿）时，常于来往信函中透露如示的信息：“第二章为史前史，已成其半，惟欲研究较新资料，不能急就……今近年泰国出土史前文化甚多……顺道赴泰搜集资料”、“我从法国回来后，即去泰国搜集史前资料。返星后又再搜集印尼方面的史前资料……现根据所搜集得的史前资料，重写第二章”、“第二章已经完成……这一章完全是东南亚考古发掘的重要资料简略报道，和目前对史前遗物研究的新方向和新方法。这两章文字应该加插一些必须的地图和史前遗

<sup>10</sup> 另有《东南亚地理总纲》（东南亚研究所，1971）一书，遍寻未得，只能附注于此。

物”。（廖文辉、曾维龙2006：165-169）可见他对史前考古动向和发现的留意，同时身体力行，亲自搜集资料。

分期研究是把握历史发展脉络和特质的不二法门，他曾尝试将马来亚史进行分期，他以民族文化的活动为分期标准，将马来亚史分为史前史、古代史、中世史、近世史和现代史五个时期：史前史是原始民族的石器时代；古代史自公元初至9世纪，为蒙吉蔑人（Mon-Khmer）奴隶社会时代；中世史自10世纪至15世纪，是马来民族的封建社会时代；近世史自16世纪至大战结束，是欧洲人的殖民时代；现代史是光复以后的民族自决时代。（许云樵1962：1）他在马来亚历史文化发展上主张“外来论”的看法，他认为“不但远古的一切都是外来的，就论目前周遭的一切，还循着这个传统：我们赖以经济命脉的橡胶，是从巴西传入的，我们已定为国语的马来语，不但吸收着难以数计的外来语词，甚至连所用的两种文字——阿拉伯化的Jawi和罗马化的Rumi——也都是外来的，目前已构成八百万人口的华巫印三大民族，也都是最近一千年内分别移入的。典章制度、宗教信仰，全都是外来的。马来语的本位文化，便是由这许许多多外来的因素所混合形成……”（许云樵1961b：8）马来亚的一切，都有其‘外来’的传统——这也是它所以成为马来亚的特征。

经过30年不间断的努力，终有所成，除了完成多篇的文章，最具代表性的是《马来亚史》，它是华文学界迄今唯一具备学术高度的马来亚通史专著。从1930年代以来，除了许云樵《马来亚史》和《马来亚近代史（上下册）》（许云樵1962）而外，华文源流学界共产生六部马来亚通史的著述，它们是：

1. 黄泽苍，《马来亚》（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著者从事地志之编著颇具心得，故体制严整，除概述外，四章分述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柔佛保护邦及其他马来诸邦之疆域，自然，历史，经济及民生。（许云樵1959a：68）
2. 张礼千，《马来亚历史概要》（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sup>11</sup>：本书凡收论文四篇，以首篇最为重要，篇幅亦最长，故以名书。该篇分四节，叙述中国古代与马来亚之关系，欧风东渐时的马来亚，今日的马来亚与统计表。其他〈英荷在东方的斗争〉与〈1824年之英荷条约〉，均为译文。（许云樵1959a：71）
3. 傅无闷，《马来亚》（1939），内容不详，著者曾任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总编辑多年。（许云樵1959a：71）
4. 赵世洵，《马来亚建国史》（新加坡，世界书局，1957）：卷首有许云樵序，正文分上下篇：上篇为建国前的马来亚，凡10章大多译自联合邦之政府常年报告书，下篇为马来亚独立经过，凡12章。此书虽极简略，然可予人以马来亚历

<sup>11</sup> 张礼千为江苏南江人，在30年代初南来，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归国，此书成于新加坡，故列入论述范围。此外，另有一书书名为《马来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为姚楠翻译温士德爵士之作品，但不见于《叙录》和《南洋文献叙录续编》。姚楠毕生勤研东南亚史，是马新东南亚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他与张礼千同期归国，此为归国后之作品，故不在所论之列。详见[http://www.lib.nus.edu.sg/ch2/chineseoverseas/oc\\_yn.html](http://www.lib.nus.edu.sg/ch2/chineseoverseas/oc_yn.html)。

史之概念，惟此书为应时之作，故下篇特详。（许云樵1959a: 68）

5. 许云樵译、陶德甫（G. P. Dartford）著，《马来亚史略》（新加坡，联营出版有限公司，1959）：本书由陶德甫之英文原著*A Short History of Malaya*一书译出，译者附注约二万言，原书不著译者氏名。内容分13章，仅第一章〈石器时代与马来亚初民〉及第二章〈马来亚与中国印度的关系〉及第三章〈满刺加王国〉叙述马来亚古代及中世史事之大纲，后十章均叙欧人东来后四百余年间之史实，尤注意英人涉足马来亚后之记载，自第八至第12章，均述战前英人之政绩，第13章则为〈大战与和平〉。章末均附年代表。书末附插原著再版时所增订之一章〈共产党的背叛〉。（许云樵1959a: 73）
6. 南洋研究会编，《马来亚史纲要》（香港，南华，1959）：本书以黄泽苍之《马来亚》一书覆印，改头换面，题《马来亚史纲要》，抹煞作者而称南洋研究会编，剽窃而称研究。内容乃一简略之旧地志，而称史纲，尤误人不浅。（许云樵1959a: 73）

以上六书，《马来亚史纲要》为一剽窃作品，可略而不论；而《马来亚史略》为译作，非著述；黄泽苍《马来亚》之体例偏属地志，并非通史体例；张礼千《马来亚历史概要》乃一论文合集，四篇文章有两篇是译文，非通史性质的著述，于体例不符；至于傅无闷的《马来亚》因资料不祥，难以论列。准此，符合并达到严谨通史著述资格和意义的仅有两部。一部成于独立建国之前，即赵世洵的《马来亚建国史》，是在许云樵的鼓励下完成；（赵世洵1957: 1-2）而许云樵的《马来亚史（上册）》则成于独立建国之后。由此可见独立建国以后出版的马来亚通史著述，无论是著述或是翻译，无不与许云樵有关。许著通史出版至今已逾50年，一本以华文书写的通史著述仍不见出世，更遑论超越许云樵的通史著述，简直可望不可及。反观在英文的马来亚通史著述方面屡有佳作<sup>12</sup>，怎么不令人感叹！

迄今为止，马新可说仍未产生一本以华文书写，深具学术水准，符合通史规格，其内容从马来亚史前写至现代的完整通史。许云樵的《马来亚史》可说是马新第一本以华文著述深具水准的马来亚通史著作，为士林所重，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只写至上古和中古部分，至于马六甲王国或以后的历史则付之厥如，所以仍未能完全符合通史的著述体例。事实上，《马来亚近代史》虽以轻松的掌故式文体书写，并非严谨的学术著述，但胜在以丰富的史料组成，言之有据，详细清楚的将马六甲王朝以来至独立建国的历史如数家珍，有条不紊的论列，所表述皆有所本，同时也展现他对马来亚史的观点。可以将此书视为《马来亚史》的接续，可以完整的呈现许云樵马来亚史论述面貌。另外，还有《新加坡150年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例排列新加

<sup>12</sup> 例如J. Kennedy, *A History of Malaya* (London, 1962) 和Barbara Watson Andaya and Leonard Y. Andaya, *A History of Malaysia* (1982), 是其中的代表。

坡历年大事，属于史料性质。除了上述几部专著，另有13篇有关马来半岛古国考辨的研究文章，其中有五篇是与他人论辩的文章<sup>13</sup>，有一篇是与张礼千联名发表（许云樵1954b: 47）。13篇文章中以中外交通史的角度论述的就占了八篇<sup>14</sup>，除少数几篇，皆采用考证方法来论史。

此外，大部分马来亚史研究的英文源流学者不谙汉语，他们使用的中国古籍不是翻译文献就是转手引用，无法很好引用中国载籍，许云樵精通汉典，往往可以纠正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谬误。如吉兰丹顾问官任子（Anker Rentse）的*History of Kelantan*（《吉兰丹史》），著者不谙中文，且未博览中国古籍之译本，因此对于吉兰丹古史茫然无所适从，甚不可取；林尼汉（W. Linehan）的*A History of Pahang*，由于作者不谙中文，其中不无谬误，即使征引西方典籍也有疏忽之处。（许云樵1946: 153-154）同时许云樵的成果也常有西方学者引用，他夫子自道：“历年拙作，蒙西方权威学者们不弃，时加征引，且据以校讎西方学者的失误，因此使我惕然以惧。”（许云樵1961a: 194-195）最常引用其成果的莫过于马来亚古史研究学者白德尔，战前白德尔构筑马来亚古史的鸿文时，曾数度和许云樵讨论古国方位，并征引其论文。<sup>15</sup>例如白德尔考证赤土国都的位置时，扬弃著名大学者如卢斯（Dr. Luce）、蒙士（Ir. J. Moens）、赛岱司（Coedes）的意见，而接受许云樵宋卡的主张（Roland Braddell 1950: 11-16），白德尔认为许云樵的语文知识和生活环境为校勘英法译文的有利条件，值得信从。（许云樵1960: 142）由于两者过往密从，研究领域一致，且惺惺相惜，时有切磋，故此，有理由相信许云樵《马来亚史》的著述方式有参考或仿照白德尔的地方。

<sup>13</sup> 这五篇文章是〈关于狼牙修的对音及其它〉（《南洋学报》，第10卷第2辑，1954，页48）、〈狼牙修方位商榷的商榷〉（《南洋文摘》，第5卷第5辑，1965，页11-13）、〈蒲罗中问题的再商榷〉（《东南亚研究》，第6卷，1970，页49-54）、〈蒲罗中问题赘言〉（《东南亚研究》，第6卷，1970，页58-63）、〈詹詹小言谈学术〉（《东南亚研究》，第6卷，1970，页88-73）。

<sup>14</sup> 除了上述五篇，其他三篇是〈丹丹考〉（《南洋学报》，第1卷第1辑，1940，页13-23）、〈关于程日焮及其它〉（《南洋学报》，第10卷第2辑，1954，页47）、〈柔佛考〉（《柔佛州中华商会联合会30周年纪念刊》，1977，页109-132）。

<sup>15</sup> 许云樵，《北大年史》，页154；许云樵，《马来亚史》，页194-5。白德尔的巨篇鸿文题名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Ancient Time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the Straits of Malacca”（《马来亚古史研究导论》），分五期发表于战前的*JMBRAS*（《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13（2）:70-169, 1935; 14（1）:10-71, 1936; 15（3）:64-126, 1937; 17（1）:146-212, 1939; 19（1）:21-74, 1941。此文由于战事而辍笔，战后他又续写“Notes on Ancient Times in Malaya”（《马来亚古代考》），分六期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学报》，20（1）:161-186, 1947; 20（2）:1-19, 1947; 22（1）:1-24, 1949; 23（1）:1-36, 1950; 23（1）:1-35, 1950; 24（1）:1-27, 1951。

### 三、暹罗史的研究

在许云樵东南亚史的治学领域内，暹罗史可以说是他最早入手的地方。一般上在马新华文源流治东南亚史的学人主要以马新史为主，能兼及其他东南亚国家的为数甚少，许云樵在这方面的研究可说是相当特殊的，学界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他的马来亚史、南洋史和华人史等方面的成就，反而忽略了许云樵在暹罗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

本节的目的即在介绍许云樵在这方面的研究概况和成果，在步入正题之前，有必要针对许云樵和暹罗的密切关系作进一步的了解，如此方可看出许云樵钟情于暹罗史研究的因缘。

#### （一）许云樵与暹罗的关系

许云樵南来之初，亦即从1933年至1938年，共约五年的时间是在暹罗渡过的。在这段期间，许云樵先后分别于北大年和曼谷教书。1933年年底，许云樵应友人吴学濂之邀请，前往泰国北大年中华学校主持校务，前后共三年，并于教学之余开始着手进行北大年史的研究。1934年，许云樵于中华学校任教时，认识了生长于暹罗，见长于暹罗语文的刘景香女士，并与之共结连理。

不久，暹罗政府大事排华，强迫华校改授暹文，以暹语为媒介语，否则加以封闭，缝此巨变，许云樵即辞去中华学校职务，改任曼谷国立商科学院教授英文。此时，华校支离破碎，许云樵睹景心伤，写成一篇〈暹罗教育及暹罗华侨学校〉的长文，评述暹罗教育的史乘及概况，政府摧残华侨教育的背景及得失，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发表。

1938年，銮披汶（Pibun Songkhram）掌政，雷厉风行排华政策，强行关闭华校，极力摧残华校的生机，许云樵颇为愤慨，只得收拾行囊，离开曼谷国立商科学院，挈眷回返新加坡，将其长子留在暹罗，托由外祖母抚养。他对北大年未能忘情，著有〈北大年竹枝词〉数首，其中〈忆北大年〉一首：“丰草长林北大年，梯航去国程三千，蛮夷壮死英风烈，手足情深佳话传。巾帼争雄光史册，后生橐笔吊前贤，众咻一传悲穉子，七载幽居不忍捐。”足见他对北大年的情感。

许云樵在回返新加坡后，开始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尤其他对暹罗史的研究，使他在泰国的史学界颇享声名，也因此他常常参与暹罗的学术活动和参加学术团体，并且持续暹罗史的研究工作，续有著述发表。

1941年1月2日，南洋学会第一届年会在泰国首都曼谷之海天楼举行。许云樵自备旅费代表理事会及新加坡方面的会员出席会议，而会议一切费用则由学会负担。许云樵抵步后，受到当地新旧会员的热烈欢迎，并于会议中被公举为主席，同时也被选为八位全权代表之一。他也受特约撰述专著五种。1月4日，南洋学会第二届理事会成立，随即召开第一次理事会，公推刘士木为理事长，姚楠为秘书，韩槐准为

财政，许云樵为学报主编。

战后，1946年5月，许云樵至曼谷，与当地热心研究暹罗之人士共同发起组织暹罗研究学会，选出理事七位，许云樵被选为驻马来亚代表。12月，许云樵趁北上到暹罗的机会向暹华文化界名流多人为其主编之《南洋杂志》邀稿，并亲自带返卢维基和陈须臾二人之文稿，即〈战后暹罗华侨的金融事业〉和〈战后暹罗华侨报业动态〉，刊登于第4期之《南洋杂志》（1947年2月）。

此外，许云樵的太太和孩子为泰国人，每年皆会回泰国，（许苏吾1982：57）可见他虽离开泰国，但仍与泰国方面的学界，保持紧密互动。

## （二）许云樵的暹史研究及其贡献

其实许云樵进行暹罗史的研究时间是相当的早，早在许云樵南渡之前，他已经上海出版了首部南洋研究的著述——《暹罗王郑昭传》，此书乃暹人朗苇吉怀根所著《世界通史》的其中一节的节译，由上海商务印务馆于1926年出版，列为《史地小丛书》之一。在此之前他已对暹罗历史上的传奇人物郑昭作了不少研究的工作，由于他发现原文提要钩玄，叙事明晰，并且还发现很多史料，为一般暹史所隐蔽不敢说的，例如：“郑昭晚年致疯的原因，大家都以为沉迷佛事过甚所致，他却告诉我们实在为了两个皇妃的缘故。”（许云樵1936：9）所以才将之转译为中文面世，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南来之后，由于在泰国教学的关系，让他易于接触泰国的文献资料，并且能进行实地考察，无疑如虎添翼，增添他研究上的助力。除了这个表面因缘，许云樵进行暹史研究，还有一层文化心理的因素，暹罗虽然“是世界上华侨最多的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最久远，最密切，可是国人对于暹罗的认识，却是不足够，最颠预；其最大的原因是注意的人太缺乏，太不求甚解了！”（许云樵1940：37）这促使他在战前写了不少相关的著述，一部分发表于泰国的华文报章，如《暹罗华侨日报》、《曼谷中原报》等是；另一部分则发表于马新的报章杂志，如《南洋学报》、《星洲日报·南洋文化》和《南洋史地》；还有部分战前不及发表，战后陆续发表于马新和泰国。

许云樵的暹罗史研究大要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基本完成于战前，第一部分是属交通史范畴的中暹和日暹交通关系研究，其中文长三万言的〈中暹通使考〉为其早期在这领域的代表作。其他相关的文章还有〈郑昭入贡清廷考〉、〈郑昭贡使入朝中国纪行诗译注〉、〈郑昭入贡清廷之暹字表文〉、〈琉球暹罗通使考〉和〈琉球大泥通商考〉等。（廖文辉2012：228-230）第二部分是暹罗古史研究，主要以考辨暹罗古国为主，可细分为暹罗史和北大年史，暹罗史部分涉及的文章计有：〈暹罗古国考〉、〈赤土考〉、〈堕罗钵底考〉、〈大小八百考〉和〈泰族是印度尼西亚人吗？〉，上述文章以考史为主，尤侧重于暹罗古国古地名的考证。此外，还有三篇中印半岛古史地名考证的论著，由于许云樵并无专注于中印半岛的研究，这三篇基

本上应该属于其中外交通研究的著述，但古代中印半岛和暹罗关系至为密切，也可将之视为暹史研究的副产品。这三篇文章是〈真腊故都考〉（许云樵1938c：9-12）、〈老挝考〉（许云樵1939：71-78）、〈读扶南考证〉（许云樵1938：5-7）。

第三部分则是北大年史的研究，虽然仅得《北大年史》一种，但却是目前这领域研究的经典。此外，另有好一些散篇文章，如〈北大年史话〉、〈英国东印度公司通商北大年考〉和〈大泥考〉等，基本上是从《北大年史》节录出来发表的。北大年位居古代海上交通要冲，商务繁盛，舟车辐辏，很早就和中国发生关系，也是古代华人往来和定居的一个大埠，早就引起许云樵的研究兴趣。1933年许云樵在北大年中华学校主持校务，并于教学之余开始着手进行北大年史的研究，埋首故纸堆中，辛勤勾勒资料，并作实地考察。此书是许云樵早期的得意力作。他侨居北大年多年，早就立志编写一部北大年史。他费了八、九年的时间进行调查访问，实地考察，广泛参考约百余种中英及其他国家的载籍，收集和考证有关的史料，最后才埋首写作，费时六、七个月方始成书，凡十余万言。全书共分五章，首章总述北大年的位置、名称、古史及其称为暹罗的藩属；二、三、四章分别考证其创建、全盛及衰灭；末章则论述当地华侨的历史，并列举九名华侨历史人物。此书虽完成于战前，但要待得战后方才由新加坡南洋书局出版。此书出版虽然已逾六十载，但不论英巫文的类似著述，仍无一可以之相掎，这主要是许云樵利用了多语种的文献，尤其是中文载籍，更是英巫文著述所望尘不及的，另外他在末章的华侨史，更是英巫文著述所没有的。同年10月，许云樵完成〈林道乾略居淳泥考〉，此文其中一个最大的创获乃纠正了明代以来文莱别名淳泥相牵合的问题。（许云樵1935：81-89）

战前，许云樵的暹罗史研究已经在学界颇著声誉，暹史研究者陈棠花在其主编的《暹罗华侨日报星期刊》的编后话曾说：“〈读扶南考证〉一文的作者许云樵先生，他是一位研究暹罗最有心得的前辈。编者好几次想修书问候，兼索其对研究暹罗的文献，终以事忙未果，兹以编者〈扶南考证〉一文，逗出许先生惠来佳作。这次抛砖引玉，确是编者的一个意外收获。由于这一次开端吧，我们希望许先生常赐鸿篇，藉资砥砺！”（许云樵1938a：7）而许云樵的这篇文章却是批驳陈棠花的论著，反而能得被驳斥者的不吝赞美，除了显示编者的器量，也可见许云樵的暹罗史研究地位的非凡。

许云樵在暹罗史研究上最大的贡献厥为沟通中暹史料，当时不论中国或南洋华文源流的学界，虽已经对南洋史地进行研究，但对暹罗的隔阂依旧，发表的论著“大多缀拾报纸上的片断材料，或是西人的著述，其肤浅固不必说，其讹误更难幸免。”（许云樵1940：37）这其中的问题在于许多研究人员，不是不谙暹语，就是不懂汉语，只能借助其中两种语文的载籍进行研究，如有“暹史之父”雅称的昙龙亲王，毕生致力暹史研究，暹人研究暹史没有不以他为宗主的，受重国际，但他不谙中文，无疑是暹史研究上的缺憾，“在他的著述中，不免有些传误处，同时也因此犹未能将暹罗史补充的完整”。（许云樵1940：37）而许云樵以其精熟的暹语，

以汉典为基础，参照西籍，出入暹典，融通三方的文献，李长傅曾于阅毕许云樵的〈林道乾略居勃尼考〉后，修了封书信赞誉此文“沟通中暹史料，考证详确”。

（廖文辉、曾维龙2006：109）李长傅的评断是极为恳切如实的，沟通中暹史料是许云樵在暹史研究上不二的贡献，当无疑意。这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暹罗”名称的由来，即便如伯希和、爱莫涅（Aymonier）也无法提出一个合理满意的解答。许云樵则于〈暹罗古国考〉译文中作了如斯的解释：

关于明史“其后罗斛强，并有暹地”，及明《一统志》“暹始降于罗斛”两语，伯希和曾对之表示怀疑，以为罗斛既并暹，据理不应以降国之名列首。但我以为暹初强于罗斛，故两国并举时每作暹罗。故两国合并以前，13世纪末年，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已有暹罗之名，“西南距暹罗半月程”。故《明史》〈暹罗传〉太祖所赐之印即曰“暹罗国王之印”。此盖中国朝廷方面为之，罗斛国本已自称为室利阿逾陀耶国（Krung Qri Ayudhaya），对于中文既不明了，怎会去辨“暹罗”、“罗暹”两字的先后呢？（许云樵1938b：5）

并且还说明“暹罗”两字的连用，并非始于洪武十年（1377），也不是始于明初。

此外，他也以两万个暹罗语词分析研究其来历，发现其中9,240个属外来语，而中国词语仅占1.2%，甚至不及吉蔑语（3%）和爪哇语（1.5%），更遑论占93%的梵语和摩揭陀语，强有力的推翻暹语是“以中国语言为根本”、“暹罗的语言十分之七是中国话”的论点。（许云樵1940：44-45）

另外，许云樵对暹文研究成果和原始史料的汉译也值一提。由于东南亚研究涉及许多不同的在地或西方文献，如果将这些不同语种的文献汉译无疑嘉惠学界，也有助于研究情况的提升。当时一些学者因为研究之需，已先将有关文献转译，许云樵也不例外，为了研究暹罗史，翻译了不少暹文的资料，如〈吉打纪年中之北大年起源说〉、〈郑昭入贡清廷暹字表文〉、〈郑昭贡诗入朝中国纪行诗译注〉等是。

〈吉打纪年中之北大年起源说〉则是将《吉打纪年》中有关北大年的起源之文字加以译介；〈郑昭入贡清廷之暹字表文〉则是将暹罗宫中档案的进贡清朝表文加以译介，让后人可以一睹表文的内容；〈郑昭贡诗入朝中国纪行诗译注〉则将郑昭入贡清朝的贡船侍卫途中见闻的纪行诗转成五古介绍给华文学界。（许云樵1951a：16-19）

除了上述之研究范畴，许云樵另有不少与暹罗史研究的文章散见于其他类别的研究，如语言学的部分有〈暹罗语言与韵律〉（许云樵1957b：24-40）、〈关于暹名译写的统一问题〉（许云樵1938e：5-9）；华侨华人的部分有〈暹罗教育与暹罗华侨教育〉（许云樵1936b：213-232）、〈泰国华文报业现况一瞥〉（许云樵1979：12-13）等；还有他也写有〈暹罗邮票史〉（许云樵1941：129-151）和〈郑昭外传〉（许云樵1938d：590-591）等文，这里无法一一赘举。

## 四、结语

许云樵毕生投入东南亚史研究，而马新和暹史研究可谓仅次于交通史以外，取得最为丰硕成果的领域。马来亚史的研究方面最可注意者是许云樵对马来亚国史建构的努力，尤其是古代史的建构，他能将模糊不清的古史勾勒出一个轮廓，同时也注意史料的译介。他的《马来亚史》在马新华文源流相关著述上，虽非第一部，但无疑是第一部符合通史体例的学术著述。此书同时也是首部对马来亚古史进行详细论述的著述。至于暹罗史研究方面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即中暹和日暹交通关系研究、暹罗古史研究，北大年史研究，而他在暹罗史研究上最大的贡献厥为沟通中暹史料，并对部分暹文研究成果和原始史料进行了汉译。他的暹罗史研究有两个值得留意的特点，首先是以考史为主，其次是在东西交通研究的框架下进行暹罗史的研究。古史地的考证实际上是东西交通研究的其中一个内容，它的暹史研究基本不离这两个范畴。

## 参考文献

- 崔贵强，2001。何国忠编《承袭与抉择：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人物（文化篇）》，台北：中央研究院，页131-175。
- 廖文辉，2004。〈试论许云樵的乾嘉朴学传统〉，《海华与东南亚研究》，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第4卷第1期，页71-92。
- 廖文辉，2005。〈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史学的地位与局限〉，何国忠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页143-161。
- 廖文辉，2006。〈试论许云樵在马新学术上的贡献〉，《新纪元学报》，第3期，页1-27。
- 廖文辉，2008。〈许云樵的历史文献学〉，《新纪元学报》，第4期，页3-15。
- 廖文辉、曾维龙纂注，2006。《许云樵来往书信集》，加影：新纪元学院。
- 廖文辉，2012。〈许云樵的中外交通研究〉，李志贤编《南洋研究：回顾、现状与展望》，新加坡：南洋学会与八方文化创作室，页205-235。
- 邱彩韵，2010。《马新汉学家许云樵研究》，台湾成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许苏吾，1982。〈许云樵教授逝世前后〉，《南洋学报》，第37卷第1、2期，页54-60。
- 许云樵，1935。〈林道乾略居浣泥考〉《东方杂志》（复刊），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页（研）81-89。
- 许云樵，1936a。《暹罗王郑昭传》，上海：商务印书馆。
- 许云樵，1936b。〈暹罗教育与暹罗华侨教育〉，《教育杂志》，第26卷第1号，1936年1月10日，页213-232。
- 许云樵，1938a。〈读扶南考证〉，《暹罗华侨日报星期刊》，1938年5月7日，页5-7。
- 许云樵，1938b。〈暹罗古国考〉，《暹罗华侨日报星期刊》，第1卷第17、18期，页5-7、5-7。
- 许云樵，1938c。〈真腊故都考〉，《暹罗华侨日报星期刊》，第34期，页9-12。
- 许云樵，1938d。〈郑昭外传〉，《南洋周刊》，1938年12月26日，第6期，页590-591。
- 许云樵，1938e。〈关于暹名译写的统一问题〉，《暹罗华侨日报》，页5-9。
- 许云樵，1939。〈老挝考〉，《中原报·泰国研究》（曼谷），第1卷，页71-78。
- 许云樵，1940。〈读暹罗华化考〉，《东方杂志》复刊，第37卷第4号，页44-45。
- 许云樵，1941。〈暹罗邮票史〉，《南洋学报》，第2卷第2辑，页129-151。
- 许云樵，1946。《北大年史》，新加坡：南洋编译所。
- 许云樵，1951a。〈郑昭入贡清廷之暹字表文〉，《南洋月报》，1951年4月，第2卷第11期，页16-19。

- 许云樵, 1951b。〈分茅岭出土之古石刻〉, 《南洋学报》, 第7卷第2辑, 1951年12月, 页33-34。
- 许云樵, 1954a。〈吉兰丹瓜家新石器时代骸骨发现记〉, 《南洋学报》, 第10卷第1辑, 1954年6月, 页46-48。
- 许云樵, 1954b。〈关于程日焮及其它〉, 《南洋学报》, 1954年12月, 第10卷第2辑, 页47。
- 许云樵, 1956a。〈马来亚的地形和地质〉, 《星期六》, 353期, 1956年6月9日, 页3-4。
- 许云樵, 1956b。〈怎样研究地理〉, 《星期六》, 372期, 1956年10月20日, 页3。
- 许云樵, 1957a。〈马来亚新志总纲〉, 载《马来亚新志》, 吉隆坡: 中国报有限公司, 页1-23。
- 许云樵, 1957b。〈暹罗语言与韵律〉, 《南洋学报》, 第13卷第2辑, 1957年12月, 页24-40。
- 许云樵, 1959a。《南洋文献叙录长编》, 《南洋研究》, 第1卷。
- 许云樵, 1959b。〈东南亚气候垂直和地形破碎〉, 《行动周刊》, 第12期, 页27。
- 许云樵, 1960。《五十年来的南洋研究》, 载刘问渠编, 《这半个世纪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刊》, 檳城: 光华日报, 页133-150。
- 许云樵, 1961a。《马来亚史》, 新加坡: 青年书局。
- 许云樵, 1961b。〈代序〉, 《马来亚史》, 新加坡: 青年书局, 页1-8。
- 许云樵, 1961c。〈马来亚古代史研究〉, 《马来亚研究讲座》, 新加坡: 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页8-18。
- 许云樵, 1961d。〈柔佛的港主制度〉, 《南洋文摘》, 第2卷第8期, 1961年8月, 页23-27。
- 许云樵, 1962。《马来亚近代史》, 香港: 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 许云樵, 1968。〈沙峇新志〉, 《南洋文摘》, 第9卷第3期, 页145-155。
- 许云樵, 1975。〈柔佛考〉, 《新山州中华商会联合会30周年纪念刊》, 1977, 页109-132。
- 许云樵, 1979。〈泰国华文报业现况一瞥〉, 香港《地平线》, 第3期, 1979年2月, 页12-13。
- 赵世洵, 1957。《马来亚建国史》, 新加坡, 世界书局。
- Roland Braddell, 1950. "Notes on Ancient Times in Malaya", *JMBRAS*, 23 (1) :1-36.

(责任编辑: 朱锦芳)